
新聞專業的新視野：
媒體實踐與台灣的問題

蘇蘅*

摘要

過去十多年社群媒體快速興起，深深影響媒體產業的新聞工作者態度與行為。本文探討西方新聞專業主義概念在台灣形成過程，以及近年來的轉變。西方新聞專業主義奠基於西方民主社會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基礎，成為全球最常援引的專業概念，但是台灣受到政治和經濟力的交互滲透，影響媒體專業的穩定發展，因此有探討必要。本文先描繪新聞專業主義引入台灣的初始概念，接著以西方新聞自律與自主為主軸，討論台灣新聞工作者的環境如何形塑不同的專業經驗，並導致專業實踐薄弱的原因。最後探討過去二十年間，新聞環境的劇烈變化，造成媒體大量裁員、記者社會角色改變，及專業價值消退。本研究發現，古典哲學除了孕育專業倫理概念，卻忽略「道德勇氣」在專業價值的重要性。本文最後建議在重建新聞專業理論與概念時，應納入西方近年主張的「專業勇氣」，探討哪些專業觀點仍需堅守和新增，採取開放態度，克服當下科技帶來的挑戰，重塑危機中的專業概念。

關鍵詞：新聞專業主義、媒體轉型、專業勇氣、新媒體、台灣

*蘇蘅為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聯絡方式：herngsu@nccu.edu.tw

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1830 年代以來，美國媒體產業不斷鼓吹新聞業的獨立自主，使得專業概念抬頭，形成新聞業自我規範的主流價值，影響及於全世界。然而 2000 年以來，近二十年新聞業發生極大改變，社群媒體出現後，新聞媒體快速走向社群化傳播，媒體重視形式和報導用語創新，公民新聞和使用者生成內容快速成長，帶給新聞產製與內容新的衝擊，無論新聞選擇或標題營造，多重視如何吸睛，但是對於「專業」作為媒體工作的核心價值和實踐理念，卻產生動搖。

新聞專業主義理論認為新聞工作應由專業人士負責內容創建、過濾和傳送 (Deuze, 2007: 142-170; Ryfe, 2009; Witschge, 2012)，古典專業主義更強調客觀的重要性，並認為客觀性規範即是記者扮演公正，中立，公平和可信資訊提供者的基本要求 (Deuze, 2005: 446-447)，客觀性規範也衍生了要求記者以追求真理、實現真實、準確、平衡和公平的報導為職志 (Tuchman, 1978) 的專業意理。

然而新聞環境的發展趨勢和外在條件變化，似乎都和過往的新聞工作者以專業主義參與客觀公正的新聞業產製和實踐的理想背道而馳。這些新發展挑戰專業主義的社會文化理論基礎，也動搖此一行業原有的倫理規範。新聞倫理主張新聞工作者應具有特定的道德感，專業和倫理伴隨並行，產生對行業的約束力和正當性，也促使新聞業成為一種公共服務、追求公共利益的行業，如今新聞業對「公共」承諾的基礎正在瓦解。

何以致此？原因很多，互動科技和新聞「移民」到網路平台帶來的影響是重要原因之一。政治、社會和經濟環境的變化也有推波助瀾之效。

科技方面，網絡連結和社群媒體互動分享的特性，讓記者愈來愈重視對話 (Artwick, 2013)，由於每個記者或媒體參與社群媒體以及與受眾互動的程度不同，使媒體的新聞選擇產生質變：部分媒體更重視流量和吸睛程度，影響傳統新聞價值的判斷，導致媒體娛樂化效果更為明顯；社交化傳播容易使媒體重視網路活躍的話題，以及新聞與活躍人士的連結，使記者更重視線上來源的資訊採用，蒐集資訊方式的改變，也動搖記者事實查證的生態，過往以「質性查證」為主的資訊尋求與處理，很容易變成以點

閱率為導向的「量化」取向，加速新聞業本質的全盤改變。

換言之，網路科技的快速傳遞與社群連結功能，使媒體蒐集資訊和產製新聞更有效率，但也改變作業常規。原來需要更多時間查證事實的守門過程，在當下更重視一天中隨時要出新聞的情況下，新聞時效比追求正確更重要，媒體守門的專業角色因此逐漸消解。許多訊息發生和新聞採訪需要同步作業，時效追求侵蝕媒體守門審查的重要性和責任感，這些累積式的快速變化，對專業產生的負面衝擊難以言喻。

學者多認為，在社群媒體時代，過往新聞組織最重視的可信度和信任感已經不能視為理所當然 (Knight & Cook, 2013; Silverman, 2014)，Curran (2010) 和Franklin (2012) 認為新聞媒體這種改變在過去的歷史進程前所未見，讓新聞組織充滿矛盾衝突：記者究竟應該重視哪些查證的實踐？新聞內容如何不被網路的「使用者產製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 全盤操控？媒體和記者如何判斷各種來源的真實和正確？媒體如何承擔及轉化個人化內容為公共訊息？在在挑戰新聞專業。

另一方面，新聞媒體的外在經營環境也和過去大為不同。

近年Google和臉書兩個科技巨頭幾乎主宰線上新聞派送，新聞媒體的數位廣告營收大部分被社群媒體襲奪 (Chyi, Lewis, & Zheng, 2016)，出現新聞來源擴散成長和非中央化現象，被Ramonet (2011: 25) 稱之為「新聞爆炸」(journalism explosion)，他用傳統新聞正在解體 (traditional journalism is disintegrating) 形容此一現象。更有學者稱為「新聞業的危機」(journalism in crisis)，表示新聞業正感受到空前未有的改變，更是新聞業面臨生存正當性和合理性的嚴峻考驗。新聞業更面臨科技巨頭以外的新競爭，許多國家出現許多「塵媒體」(dust media)。塵媒體是指數位時代的新科技讓社會出現許多如星塵般的小媒體，也因為社群網絡普遍，自稱「媒體」的來源藉著社會網絡擴散而存活，成為網上多元的資訊來源 (Ramirez de la Piscina, Zabalondo, Aiestaran, & Agirre, 2016)，它們不但成為傳統媒體新聞的新競爭者，也稀釋傳統媒體新聞的「濃度」。

Franklin (2012: 663) 強調，通訊技術創新，嚴酷的競爭，以及觀眾與廣告市場的營收被大量分割，新聞媒體大砍支出，新聞業傳統經營模式崩潰。社群媒體成為媒體來源和推動新聞的角色擴張，政府的媒體政策改變，

以及觀眾改變對新聞的要求，新聞呈現方式以及用行動裝置接收的數量愈來愈多，新聞生產和消費的時空全然改變。

可知新聞業轉型，代表新聞業逐漸失去兩種主要承諾，其一是對公共責任的承諾，即新聞媒體不再以履行公共政策責任為導向，轉而重視告知和擴散訊息，以建立更多與社會大眾的連結和關係。過往由大眾媒體主導的真實資訊決定與分配、目標市場讀者、以及品質把關的能力都已轉變。其次是新聞專業選擇的承諾，上述變化使得以新聞專業和倫理為主的產製原則變得不重要，新聞分享和流量的重要性提升後，大數據、演算法作為媒體選擇新聞和行銷的機制制約了新聞本質的追求目標。新聞社群傳播化在短短數年改變新聞業生態，使許多新聞編輯室出現極大的失落感。

Willnat, Weaver, & Choi (2013) 調查三十一個國家兩萬九千名記者後發現，「全世界的記者對自己工作都不開心，他們覺得自己像其他行業的受雇者，產生很負面的感受…最大的壓力是各國新聞人員都感受需要新的多媒體技能」（同上引：178-179）。另一方面，新聞轉而重視對話和即時，反而衝擊社會大眾對新聞媒體的信心，許多民眾不再信任大眾媒體的新聞和消息來源。

學者反思此一轉變帶給新聞本質的重大影響，也認為新聞業本身必須拿出對策振衰起弊。Franklin & Carlson (2011) 分析認為，科技改變使得新聞業必須訓練優質且對新聞有興趣的特別人才投入，才能力挽狂瀾。Mahugo (2010) 反思新聞行業的變化，源於其面臨新挑戰，認為拯救新聞業，涉及如何捍衛其人文主義和社會功能；認為新聞工作者和新聞業仍應把吸引（讀者）持續參與和產製高品質新聞作為最終目標（轉引自 Ramirez de la Piscina et al., 2016）。

Pavlik (2013) 指出，新聞業未來的生存關鍵在於創新，但這種創新應該在新聞專業和倫理範疇內進行，「為了確保長期成功，新聞媒體的創新應以四項原則作為引導：對知識的研究、對言論自由的承諾、追求報導的真實正確、以及加強倫理規範。事實顯示，早年新聞業的領導者在創新時，均堅持這些原則，現在同樣的精神也將是建立閱聽眾和數位收入成功之路」（同上引：181）。

台灣的新聞專業主義起於 1940、50 年代，由美國引進。台灣新聞媒體更於 1988 年解嚴後，法規和政治的束縛大為鬆綁，帶來更多新聞自主權。但是也把媒體推入高度競爭的時代。台灣第一個專業倫理規範由台北報業協會在 1940 年制定頒布，當時倡議的專業倫理類似美國的媒體社會責任論（羅文輝、陳韜文、潘忠黨，2001）。我國學者指出，在先進國家，新聞專業主義和媒體倫理都是在自由的前提下變成媒體的自我要求，也一度提倡以美國霍金斯委員會（Hutchins Commission）的社會責任論作為新聞自律的基礎（李瞻，2009）。

李金銓（2004）認為台灣在戒嚴時期，政府主要採取的是黨政媒體所有權策略，以待從主義進行賞罰和媒體管控。然而馬星野等人在此時引入美國專業主義，不但帶入新聞媒體作為民主政治監督者的理念，亦重視美國專業主義概念的「客觀性」，以發展出一套台灣媒體社會責任的制度和策略¹。可以說台灣早期新聞專業主義以美國專業主義為恪遵規範，並以為新聞工作者若能落實專業主義的實踐，可以促進新聞業的進步發展。然而「專業」雖然在醫學和法律能作為一種基本知識、技能和執業信念的共識，也能作為培育人才的指導方針，但是能否影響新聞專業，成為規範新聞工作者的指導原則，在台灣仍產生許多疑問。

綜上，新聞媒體的環境改變，不僅帶給媒體更多衝擊，也凸顯新聞專業主義實踐不如想像中容易，不時遭遇新的困境。因此，本文目的有四：

一、綜述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理念和新聞業的關係，並說明美國新聞媒體把專業當作主流價值後，如何引入台灣，以及哪些概念在台灣特別受到重視。

二、西方專業主義作為一種符號資源，進入台灣後有何轉折，有何落差，原因為何。

¹馬星野為政治大學新聞系 1935 年 9 月在南京創系的系主任，1941 年中國新聞學會在重慶成立，由王雲生、程滄波、馬星野等人起草《中國新聞記者信條》十二條，為最早的專業信條，不過被認為影響有限。馬星野曾說：「民主政治中，建議政府，監督政府，收效最大，影響也最鉅的莫過於報紙。」代表他對新聞媒體角色的理念。註解資料整理自楊倩蓉（2012）。〈馬星野 新聞教育拓荒者〉取自政大新聞系網站：https://comm.nccu.edu.tw/zh_tw/member/link18/retired_teachers/%E9%A6%AC%E6%98%9F%E9%87%8E%E3%80%80%E6%96%B0%E8%81%9E%E6%95%99%E8%82%B2%E6%8B%93%E8%8D%92%E8%80%85-85204209，以及布萊克、布萊恩特、湯普森、張詠華（編著）（2017）。《大眾傳播通論》，新北市：崧博出版。

三、回顧新聞專業中最重要的符號概念——新聞自主和自律的演變，探討台灣在這方面的實踐。

四、近年多位西方傳播倫理學者倡議西方專業主義應重視「專業勇氣」，本文最後將探討這個概念在台灣的可行政性，並提出綜合分析和建議。

貳、激辯中的專業主義

一、新聞專業主義的萌發

西方學者認為，專業（profession）是一種以特定知識為基礎的職業，通常伴隨著一定時間的教育、專業訓練及經驗（Evetts, 2013）。不過新聞專業的重點仍在強調專業「自主」。

「自主」概念所以重要，主要是中古世紀以來的西方世界，認為國家會壓制言論，「自主」即意味把專業控制獨立於國家（政府）之外，並且立法保障這種自主權。基於這種立論，當時爭取的即是廢除印刷品的課稅和執照制度，也成為爾後「第四階級」（fourth estate）概念的濫觴（Waisbord, 2013）。

二十世紀以來，許多探討新聞、專業主義和民主之間關係的研究，多以自由主義為出發點展開闡釋（Glasser & Gunter, 2005；McQuail, 1992；Merrill, 1989；Singer, 2007），也發展出以「自主」為核心的媒體運作模式（Waisbord, 2013）。這個模式假設新聞業有了自主，才能服務民主政治，新聞業自主的前提即是新聞組織和記者都要獨立自主，才能對民主有貢獻，唯有自主的新聞才能真正實踐其民主任務，正如 Ettema, Whitney 和 Wackman（1987: 765）所說：「只是蒐集、組合、和選擇新聞，在西方社會層級裡，只是一種低階工作，但如果認為是專業，就要賦予實質的自主。」

二、新聞專業的建構主義取向

Schudson（1978）、Reese（2001）等認為，新聞專業是一種創建的漸進過程。早年媒體為了建立自己的權威和操作機制，曾經自訂相關要求，例如美國報紙於 1930 年代一度認為記者署名的新聞即是為專業負責的表現（Schudson, 1978）；也有新聞媒體認為專業即從業者應該把誠實、開放、

可信與受尊重作為職業自我規範的重要原則；亦有主張專業最重要的特質即「客觀」(Schudson, 1978)。另外就是新聞業能在公共領域自主運作。

但是新聞專業除了應是工作者的職業準則，更應被整個職業社群視為一種團體應共同遵循的美德。

Reese (2001: 174) 即說，專業不但是個別記者對新聞作為專業的一種態度，也要思考不同社會文化脈絡影響下的專業的不同，因為專業被不同新聞室實踐，不同國家也有不同新聞文化的表現。在不同國家更因新聞人員的多媒體能力不同和社會不同需求，而有不同專業的實踐，這種專業分殊如何表現，在不同國家都是十分迫切的問題 (Willnat, Weaver, & Choi, 2013: 178-179)。

Wilensky (1964) 的研究指出，職業發展成為專業通常需要經過五個過程：(1) 從業人員可以全職工作、(2) 建立專業訓練學校、(3) 成立專業組織、(4) 從業人員必須努力獲得法律保護、(5) 專業組織須頒佈專業倫理規範以約束其從業人員。其中成立學校、進行專業教育培訓是衡量一項職業是否發展為專業的最重要指標 (Freidson, 1986, 1999; Hwang & Powell, 2009)。他更指出，「新聞業要能作為一種職業」，應不只是美國或西方背景下的產物，也需要許多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共同相信新聞業具有專業，而且新聞人員的培訓和慣例都是廣泛分享的信念 (Reese, 2001)。

Reese (2001: 175) 說，儘管新聞專業和傳統「專業」必須以取得證照為條件有所不同，但是新聞業仍有許多專業的特質，包括記者應有倫理行為的實踐以及新聞業對人類普世價值如尊嚴和隱私的尊重。Zelizer (2004) 也指出，「專業」需要具備專業特質，並有必要形成專業概念的完整體系，他主張專業的特質應該包括技能、自主、服務導向、證照程序、能力考核、組織、行為規範、訓練和教育課程 (同上引：33)。

由此可知，新聞專業既是一種職業的專業要求，需要有專業規範、專業組織和法律保護，使其職業發展成真正的專業；但新聞成為專業也需要成立學校養成，透過專業培訓教育以使該職業發展為專業。不過 Reese (2001) 認為，專業如何透過教育培養是個非常複雜的問題，他認為目前新聞專業教育教學生的僅是媒體工作的入門技能，還不是更重要的公民導向專業；新聞職場的專業已經發展成一種職業、組織、甚至產業或媒體市

場內在導向的實踐，但是學校並未履行這樣的教導責任。

無論如何，上述看法多認為記者應該是公正，中立，公平和可信的資訊提供者（Deuze, 2005: 446-447），並以追求客觀報導為目標。然而新聞機構像其他機構一樣，各有各不同的邏輯運作（Friedland & Alford, 1991）。但學者以為「專業」應該是制度化的行為指導方針，並為新聞業「創造出獨特的類別、信念、期望和動機，從而構成從業人員的社會認同」（Rao, Monin, & Durand, 2003: 797）。

三、新聞專業主義為何重要

現代新聞專業主義在新聞業本身的自發行動中，逐漸成為職業上的自我要求準則，且能長期形成媒體的專業自主，具有服務行業的操作型價值倫理，「自主」預設新聞業為了獨立於經濟、政治或其他影響力之外，必須付出努力。因此專業的實踐會鼓勵從業人員某些行為，而不鼓勵其他行為。另外會因為該職業群體中，共同假設個人和機構都需要具有某種社會認同，連結了個人和組織之間的關鍵行為，並力倡透過對特定角色的採納、承擔某種身份、履行相關職責，從業人員因此感受到他們是新聞機構的一部分。才能使新聞專業為社會肯認，並受到一定尊重。

但究竟哪些是「專業主義」裡的核心價值？包含哪些次概念？這些次概念對於新聞專業為何重要？

Beam et al. (2009) 根據過往研究將專業的主要特徵，分為下列幾點：(1) 職業具有核心知識與專業技術體系；(2) 從業者具有一定的工作自主性；(3) 從業者視公共利益高於經濟收益；(4) 建立專業文化；(5) 通過教育與培訓完成從業者社會化；(6) 從業者作品並非標準化產品；(7) 該職業通常具有終身性（參見 Becker & Carper, 1956；Greenwood, 1957）。

Larson (1977) 主張，新聞專業主義作為新聞業操作的規範體系至少有三個層面：(1) 自我評價面：從業者將新聞專業和一般職業對比，強調專業的獨立性、特殊聲譽等非凡特質。(2) 規範面：表現了新聞業服務導向，賦予新聞業獨特的倫理規範，如此才能將社會授予新聞業自我規制的特權合法化。(3) 知識面：要求新聞從業者必須經過必要的訓練，以便掌握專業必備的知識和技能。新聞專業的特殊門檻由這三個層面構成，才能

使新聞業者共享一個相對穩定的社群聯盟關係；確認這種身份，才能維持特定的志趣和對職業團體的忠誠度。

Singer (2003) 指出，雖然專業的定義眾說紛紜，然而仍有著理想職業的屬性，並對某幾種價值存在共識。她進而提出三個來自社會學建構的專業主義面向，分別是認知(cognitive)、規範(normative)和評價(evaluative)，她認為可以從新聞專業主義這三個面向，探討為何某些「專業」特色對新聞業最為重要。

首先，新聞的認知維度與知識體系有關，專業記者應具有一定的知識與技能，才能從事這份工作。這種知識雖然和教育與醫學、法律不盡相同，聚焦在採訪寫作，實則關係著新聞工作者如何處理正確和重要的資訊。她指出，根據一項對新聞業者和新聞系學生的問卷調查，不但受訪者皆認為專業培養和教育是該學科是否專業的關鍵，也是美國一百多個新聞教育科系和新聞業者職業公會共同肯認的價值觀(Singer, 2003)。

其次，從規範面來看，記者為民主社會提供公共服務，已是牢不可破、歷久彌堅的信念，也是過往傳統大眾媒體共享的集體經驗和共同的象徵，可以作為為何記者需要碰觸政治社會議題，又何以能代表公眾尋求真相、及回應公眾需求之定錨(Althaus & Tewksbury, 2002)。記者需要遵守一套道德準則，以尋求真實、盡量減少傷害、行動獨立和負責任作為核心概念。唯有如此，記者才能從制衡和監督角色中，擁有受到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新聞自由保護的特權。

第三，評價面。評價面相當重視自主。專業記者應該擁有最大自主權，不讓外部力量控制新聞活動(McDevitt, 2003)。記者擁有獨立工作的權利，不能強迫就範，因為外部干預會損害他們追求公眾利益的誠信，並使他們無法為工作負起責任(Newton, Hodges, & Keith, 2004)。唯有自主，才能使記者獲得為公眾服務的聲望。權威消息來源也應認同新聞工作者應該為公眾服務，負起應有責任，才能獲得良好名聲；這些權威不要也不能控制資訊自由流通。

由於專業主義受到社會體制、政治、文化、經濟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使得專業主義的各項指標在不同地區、不同年代中，可能產生變化(Freidson, 1999; Starck & Sudhaker, 1979; Svensson, 2006)。

專業主義曾以客觀和中立作為兩個最重要的特徵，也成新聞職業的基本特性，然而學者逐漸認為新聞專業並無絕對標準（Donsbach, 2014）。傳播學者 Carey（1978）曾說，專業知識和理念並非一成不變，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新聞媒體揭發政治人物醜聞和大企業弊端的扒糞運動興起，推動社會的進步主義，也把新聞媒體的自由推到另一個高峰，也因為媒體在進步運動中表現出色，專業主義成為多數媒體頌揚的價值，媒體專業主義自此成為爭取新聞自由的火把，並成為點亮全世界新聞媒體挑戰威權的信念（Gans, 1979；Lee, 1993）。

然而 20 世紀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專業主義的操作面受到強烈質疑。在英國伯明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以及 Todd Gitlin 等左派學者影響下，媒體專業走向更「開放」，超越傳播理論的有限效果模式，批判學者 Carey（1978）、Hallin（1986）等，更看穿新聞也是一種科層組織，專業會受到有權力者和威權控制與影響，認為媒體報導受制於政治經濟力；新聞雖然更加專業化，新聞記者和新聞學院的聲望也隨之提升，但事實證明新聞想成為一個自主的生產領域，枉費心思。他們認為，一方面人們不可能不帶有色眼鏡看世界；研究也顯示，雖然西方社會的政黨和政治不能再控制任何新聞媒體，但媒體並沒有實踐它作一個政府看門狗的角色，反而和政治場域有更深的糾纏，也不是所有媒體都能做到專業和追求事實的報導。

因此 Arno（1984）認為新聞專業主義並不是一種普世價值，記者的新聞自由也並非所有人都想追求的目標，會隨著時間改變。Splichal & Sparks（1994）發現，美國、德國和英國記者在新聞專業倫理的認知不盡相同，記者對自己角色也有不同認知，德國記者偏好倡議式新聞（advocacy journalism），美國和英國媒體重視中立的角色。Patterson & Donsbach（1993）以「新聞—政黨平行主義」（press-party parallelism）比較各國記者的新聞報導和政治的關係，發現美國只有微弱的新聞和政黨平行主義，但義大利兩者關係密切，德國和英國介於中間，Chan & Lee（1991）則發現香港雖然歷經不同政治統治脈絡，但是新聞和政治間的關係非常密切。

因此，許多學者並不認為新聞界存在真正的新聞專業主義，更認為新聞專業主義只不過是媒體精英的一種標準和理想，已和普羅大眾間的看法脫節，甚至分歧（Johnstone et al., 1976；Weaver & Wilhoit, 1986；Tunstall,

1971)。

但是美國學者 Christians (2011: 33-44) 仍指出，專業主義應是普世的，其基礎是內部規範和自我約束，包括社會公正、真實、非暴力和人性尊嚴。其中媒體自主是美國新聞界的職業尊嚴和自信的表徵，實施專業的對象和踐行倫理者都是從媒體自身反求諸己，但新聞專業追求的價值也是尊重人性和人類生命的普世價值。

四、新聞自主作為一種專業價值

Weaver 等人 (2009) 對新聞工作者的長期調查均發現，新聞記者認為自主性是工作滿意的重要原因，也是新聞工作不可或缺的一環，即使在威權國家，新聞環境惡劣，監視、威嚇、起訴等手段無所不在，但是記者仍把新聞自主列為最優先，發展出有創意的策略，以維持某種新聞自主 (Hanitzsch & Mellado, 2011; Mellor, 2009)。

新聞自主的概念興起於希臘哲學萌芽期。學者認為自主是橫跨意識形態光譜的核心價值，值得珍惜，自主的新聞業才符合民主價值，因為新聞獨立才能監督社會、政治和經濟。自主是西方社會關於專業的核心概念，自主也是對職業地位的嚴峻考驗，專業需要有組織的自主，才能制定規則和要求並控制工作條件，社會學家 Howard Becker (1976: 96) 也提及專業主張即是工作的完全自主。所謂自主指無論決策和判斷都有一套「自主的知識」作為依據 (Evetts & Dingwall, 2002)。

新聞自主 (press autonomy) 則指新聞媒體可以在國家和公司之間體現獨立性。民主國家需要具體立法限制政府干預新聞甚至破壞媒體自主。當然，新聞自主的鞏固與 19 世紀幾個國家新聞所有者的經濟和政治權力的鞏固同時發生。相比之下，新聞自主是指記者根據具體規則和規範預先確定其取得處理資訊的能力，而不受其他行為者的影響，包括設置保護記者免受外部影響的障礙，以及制定規範記者的行為準則 (Waisbord, 2013)。

不過法國學者 Pierre Bourdieu (2005) 的「場域理論」揭示另一問題，即所有媒體的新聞自主並非一成不變，Bourdieu 關心經濟資本對場域的影響，並指出必須關注社會結構和文化實踐之間的複雜關係。其中有聲譽的媒體，可能能在特定場域實踐其專業知識、語言運用，進行深度報導，刊

出有洞察力的評論。但一般情形是經濟資本的力量超過文化資本，因此 Bourdieu 認為新聞場域是個自主性很弱的場域，新聞場域雖然有共建的自律規範，但是媒體的經濟資本如發行量、廣告收入或閱讀量等，是另一種重要場域。媒體並不能追求真正的自主，而具有高度的他律性，儘管媒體可以實踐一些特定領域的功能，但也不斷被自身最他律的部分進行控制。新聞工作者在政治或經濟的限制條件下工作，不像過去那樣能夠樹立起純粹的道德標準；另外從採集資訊和訊息生產的需要來看，記者已經受到外部限制，媒體亦受到政治廣泛影響，這群工作者注定不能將專業規範加諸自身（Bourdieu, 2005；轉引自 Champagne, 2005）。

由此可知，新聞自主雖然是西方新聞專業的重要主張，也在西方社會發展了兩個世紀，西方媒體無不以展現自主獨立為榮，甚至不管是質報或小報，多以自主作為媒體存在和記者自律都應該捍衛的價值（Deuze, 2005），自主長期以來多被媒體作為應該做個有品質的新聞業之自我期許（Weaver, 1998）。但由於社會條件不同，新聞專業主義在某些社會被視為難以亟及的高標準，媒體自律也多歷經長時間的公共辯論、經過新聞界不斷反省，才能形成共識。因此可知，西方新聞專業理念雖然可能在其他國家孕育滋長，但不必然深化甚至滿足該社會的需要。

美國新聞專業主義的確立是和報紙脫離政黨影響獨立同時發展。二十世紀初，美國新聞從業人員不願意再成為政黨的宣傳工具；有高道德標準的記者認為，面對當時宣傳無所不在，人為操縱新聞與真相嚴重脫節，整個報業有必要團結起來，一起維護新聞專業的正直與誠實，真正的新聞自由不但應獨立於商業利益之外，也應獨立於政黨利益之外（Schudson, 1978），因此於 1923 年成立美國報紙編輯人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 ASNE）公布新聞規約，包括負責任、新聞自由、獨立、誠實、真實、準確、客觀、公正等，其中更指出獨立是「黨派偏見破壞了美國新聞事業的最佳精神，……也違反這一專業的基本原則」（Flint, 1925: 428）。

馬星野是轉介美國新聞教育和新聞專業到中國的「新聞文化使者」，隨著國民政府遷台，1950 年擬定的《中國新聞記者信條》，對台灣新聞事業的專業化有指標性的意義。這份信條揭示維護新聞自由，善盡新聞責任，

追求正確第一和公正第一的精神，都列入條文（第二、三、四、五條），不但介紹美國專業主義的追求的目標和精神，也落實在台灣發展的新聞教育裡，從新聞機構和新聞教育雙雙仿效與實踐西方的新聞專業主義，然而也隨著環境變化而歷經轉折，將在下面析述。

參、新聞專業主義在台灣

一、新聞專業主義引進台灣與轉化

20 世紀美國記者在各種世界會議上提倡保障新聞記者的權利，1934 年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院長 Ackerman 要求美國政府以退出各種國際會議的杯葛行動來支持實現世界的新聞自由。

創設中央政治學校新聞系（即政大新聞系前身）的馬星野也因為 1931 年赴美讀書，對美國新聞專業化運動並不陌生，更因他熟悉美國 1910 年開始發起的新聞專業化運動，這種專業主義理念也隨著馬星野來到台灣，而引入新聞界。

馬星野（1967：105-106）投身新聞教育時曾說：「沒有新聞自由就沒有民主政治」，他認為培養負責任、尊重自由、有修養、道德高、觀察力強、能正確反映民意的新聞記者有助實施民主，也致力將美國報業的作法引進台灣。

薛心鎔（2003）曾經這樣描述馬星野，「馬星野先生在美國接受新聞教育，富有自由主義精神，標榜的是正義與公益。回國來辦政校的新聞教育，他仍然本著這個信念，培養的是新聞記者，不是黨政幹部」（同上引：32-33）。

馬星野於 1950 年代引進「新聞專業主義」，引進的背景是希望讓美國新聞界要求的正確、公正、客觀的經營理念和操作規範，對於新聞專業化應能發揮正面作用，然而他的專業主義並非純美國式民主監督的媒體專業，主要在否定資本家操控的報紙擁有新聞自由，他更強調新聞專業最重要的是追求民族至上、國家至上和世界和平（《中國新聞記者信條》第一條），由此可知馬星野仍然抱持媒體應該服務國家和民族利益的觀點，重視社會集體利益甚於個人權利（轉引自蔣海斐，2010）。

馬星野在 1950 年擬訂通過的《中國新聞記者信條》，對台灣新聞專業

的專業化有指標性的意義。這份信條揭示維護新聞自由，善盡新聞責任，追求正確第一和公正第一的精神。這份信條的第八條強調「參加此業者，應有高尚之品格、不受賄、不敲詐、不諂媚權勢……」。第十條提到參加此業者「對於公眾問題、應有深刻之瞭解與廣博之知識、當隨時學習，不斷求知，以期日新又新」。因此可知，這份信條有美國新聞專業主義觀，但未完全複製西方新聞的價值體系。另外他也忽略新聞工作者和新聞業追求獨立自主的原則，但這正是美國專業主義的核心價值。

二、政經環境改變中的新聞專業主義

追隨美國社會責任論的腳步，1950 年台北報業商業同業公會成立，成立大會通過採用馬星野先生擬定的「中國新聞記者信條」，以為自律策勉。這是台灣第一個由民間報業機構成立的公會。

但如果從當時國民政府遷台的處境來看，來自西方的新聞專業主義在台灣不能擺脫政治控制。也就是隨著大眾媒體在台灣普及，早年新聞教育目標卻仍如 1935 年中央政治學校（國立政治大學前身）校長蔣中正所揭示「宣傳即教育，故新聞記者應為國家意志所由表現之喉舌，亦即社會民眾賴以啟迪之導師」，並以此作為新聞界共勉之目標，包括善盡普及宣傳、宣揚國策、推動建設以及發揚民氣（王洪鈞，1993）。

馬星野於 1939 年 9 月 30 日發表〈三民主義的新聞事業建設〉，也闡述何謂符合三民主義思想的新聞學，仍不脫離民族至上和國家至上的原則，但他也主張三民主義的新聞事業目標「不是為資本家賺錢，不是為統治階級說謊，而是為著全社會中每個分子（國民），同全社會的整個生命（民族）服務」。顯示他否定英美資本主義報業體系的角，而提出儒家傳統重視國家甚於個人的概念，也具有輕財重義的作風。

不過我國新聞界仍在馬星野等人的倡議下，走向新聞自律，並發展成有組織的共同行動。

1963 年台北市報業新聞評議會成立。該會網站說明當時成立的背景，主要因為出版法修法要加重罰則，1958 年初，當時的國民黨政府為了阻止「文化三害」（赤色、黃色與黑色刊物）的氾濫，進行出版法五度修法，增訂撤銷登記與加重罰緩處分，以便循合法途徑來加強管制。這兩項增列條

款，讓新聞界深感不安，當即表示強烈反對。同年 5 月 4 日，台北市報業公會上書立法院請願，籲請廢止出版法或作合理的修改，以保障人民應享的中華民國憲法第十一條明定的新聞自由權利。台灣全省民營報業亦發表聲明，指出修正出版法違憲。台灣省雜誌事業協會、台北市新聞通訊事業協會發表聲明表示反對，希望政府撤回出版法草案。台灣省民營電台發表聯合評論，反對此修訂案。台灣省議會亦於 6 月 3 日通過臨時動議，建議立法院慎重審議出版法修正案，以維護言論自由（新聞媒體自律協會，2016）。

另一個原因是「瑠公圳分屍案」報紙報導引起社會反感。1961 年 12 月 27 日，台北市發生「瑠公圳分屍案」，直至翌年 2 月 19 日始破案。這段期間，各報競打高空，繪聲繪影，誇張渲染報導，甚至暗示或影射某人為兇手，但事後證明是無辜者，不少人受到冤屈。由於社會輿論指摘要求報業檢討反省，使得新聞評議會得以催生（新聞媒體自律協會，2016）。無論是新聞評議會、報業公會、或後來的新聞媒體自律協會，這些機構成立，意味台灣新聞媒體也可以像美國新聞界一樣，用自律的機構邏輯連結新聞機構和個別工作者，因而在社會認同、角色採納和履行責任上，都可以讓記者更容易得到實踐專業的價值，也容易形成自覺是新聞機構的一份子之參與感。

台北市報業新聞評議會成立時，當時報紙如中央日報、台灣新生報、聯合報都發表社論表示，認為「這是新聞自律的開始，也是報紙法律地位的確立」（聯合報 1963.09.02，社論），（該評議會）可以對有爭議的新聞或評論「有一公允的裁決」（大華晚報 1963.09.03，社論），可知當時該會主要工作為局部的新聞自律工作，並受理各界對新聞的投訴進行審議，並可提出對媒體不當編輯政策的評議，走向專業自律的方向。不過因為制度欠妥及其他因素的影響，工作未達效益（盧治楚，1969）。

1971 年由於媒體已不是報業獨大，當年 4 月 29 日，台北市報業公會、中國廣播事業協會（即中華民國廣播電視事業協會前身）、中華民國電視學會、台北市新聞通訊事業協會及台北市新聞記者公會擴大籌組成立第一屆「台北市新聞評議委員會」（簡稱「新聞評議會」），評議範圍包括台北市地區的報紙、廣播、電視、與通訊社在內。1974 年記者節，再把台北市新聞

評議委員會改組擴大為「中華民國新聞評議委員會」。2001 年，由台北市報業公會、中華民國廣播電視事業協會、和中華民國電視學會等八大團體成立「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新聞媒體自律協會」，目前是台灣唯一跨媒體自發性自律組織。

專業主義實踐在很多國家遇到的挑戰是國家的介入，自律是實踐新聞專業的方式之一，西方國家強調新聞自由，但是在亞洲國家往往由新聞媒體成立公會或自律組織，可以獲得部分專業自主，然而很多亞洲國家、特別是東南亞國家的新聞從業人員仍需要經過奮鬥才能爭取到專業地位（Lehmann-Jacobsen, 2017）。

羅文輝（1998）的實證研究探討台灣的新聞專業主義和新聞記者角色，認為台灣新聞記者並不一定要接受新聞專業教育及取得證照，主要因為新聞事業比重相當大的新聞從業者，並非新聞傳播科系畢業生。羅文輝與陳韜文（2004）在另一項 1996 至 1997 年的調查發現，台灣地區的新聞從業人員只有 48% 是新聞傳播科系的畢業生。因此在「專業自主」方面，雖然大多數國家的憲法保障了新聞自由，但是新聞室的運作經常受到政治與商業利益的控制和干擾。在「專業責任」上，由於新聞人員參與專業組織（職業工會）的比例偏低，諸如「中國記者信條」等倫理規範無權約束所有的新聞工作者，同時也因商業人士入主新聞事業，經營邏輯大幅改變，使得新聞人員逐漸從傳統的專業人士轉為媒體老闆的受雇者，並影響其專業承諾。另一項較新的研究（張曉等，2015）也顯示，新聞從業人員受過新聞專業教育的人數比例偏低，是新聞和傳統專業最不相同之處。

隨著時間演變，台灣另一個政黨民主進步黨於 1990 年正式成立，台灣民主政治進入另一階段。徐嘉宏（2003）研究發現，台灣的媒體體系在民主化發展的過程中，國家與媒體的關係受到很多不同力量的影響而改變，在台灣解嚴後，商業力量快速崛起，市民社會逐漸萌芽，對於國家與媒體的關係開始產生質變。戒嚴時期，由於當時是黨國體制的威權體制，國家的領導是黨政一元化，對於媒體只存在著由上而下的單向關係，國家運用黨國體系的複合組織及動員，再配合多重的政策實施，官方全面介入操控，排除異議雜聲，當時媒體主要是配合政令宣傳的教育工具。解嚴後到政黨輪替前，國家控制已經減弱許多，仍然存在隱性控制，如國民黨的文工會

仍對記者公會控制，無線電視台的所有權不願鬆手。不過媒體市場結構也因禁令解除，趨向多元化的自由競爭市場發展。此時國家與媒體存在雙向影響關係。政黨輪替後至今（2002年），除了道德及法律對內容的制衡，政治控制已大幅減少，市場法則日益居於主導。

三、新聞專業主義在台灣實踐的觀察

臧國仁（1998）在總結對媒體專業主義的研究之後指出，媒體的專業主義或者說客觀主義，通常指所謂客觀性的報導，即新聞工作者的報導講究公平、公正、公開、平衡，獨立超然，不偏不倚。媒體專業主義既是一個理念，也是一套行為方式，也即相信有客觀的事實存在，同時使用各種方法，比如儘量不受消息來源、政治經濟等客觀環境因素或議題本身色彩的影響，對正反兩方面進行平衡報導等方法，來達到客觀的目的（參見陸曄、潘忠黨，2002）。

翁秀琪（1992）認為，新聞專業和新聞媒體內部自主性有關，但是在台灣的新聞媒體組織結構下，新聞專業人員只是事業主的雇員，像其他營利事業受雇員工一樣，完全需要接受事業主的指示，為事業主的利益服務。而在現實中，如果事業主忽略新聞媒體的新聞事業倫理規範，或不尊重專業人員的專業決定，而將新聞媒體視為謀取個人經濟利益或政治利益的工具，不僅新聞人員的新聞自由未獲保障，新聞媒體也喪失其制度的功能。報禁開放的第一年，有 122 家報紙完成登記；到了 1992 年，雖有 270 家報紙登記，但只有 58 家真的出報（譚士屏，2000：42）。其中報團和財團支持的報紙歷經競爭仍能存活，反而是首都早報、環球日報以及公論報等在報禁開放後兩年內休刊。連自立晚報（在報禁開放前頗有根基）在 1994 年也轉手（林麗雲，2008）。

1994 年 6 月，自立報系爆發股權轉移風波，自立報系員工發起行動抵制財團背景的新資方，此事件得到不同報紙記者的聲援，1994 年 8 月，一個由十人組成的跨媒體小組決定發起「推動編輯部公約運動」連署。1995 年 1 月 22 日，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籌備委員會決議於同年 3 月 29 日舉行「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成立大會」，1997 年並成立「目擊者雙月刊」，2000 年改名為「台灣新聞記者協會」。

2001 年起，台灣報紙出現一波倒閉風。2001 年自立晚報停刊，2002 年勁報停刊，中央日報減薪減張。中央日報、中華日報和新生報共用新聞平台，各自出報。2003 年香港蘋果日報在台創刊，其圖像化和小報化新聞帶給本地報紙新的衝擊。但是除了報紙小報化問題外，新的問題來自電視新聞文化界線的爭奪戰。電視新聞處在新聞和娛樂文化的交界，從業者往往認為電視娛樂媒體的特性多過新聞 (Williams, 1972)。Williams 在談電視科技時，認為電視兼具影像和電影特質，帶給社會最大影響是社會和政治關係的全面改變，主要因為電視的電子科技讓其有了新的詮釋權和社會輿論主導權，其速度和聲光能夠滿足民眾的新需求，電視不僅成為新的傳播體系，更成為新的社會機構。

早在報紙倒閉風潮出現前，1999 年財團法人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簡稱「媒觀」，這個由學界、媒體實務界以及關懷媒體環境的公民所組成，是台灣第一個建制化的媒體監督暨改造團體。除了致力於媒體識讀教育的推廣，在專業上重視媒體公民權利的維護、媒體勞動權益的伸張、媒體公共性格的確立和媒體多元結構的建制。

張文強研究電視新聞特質，並從實務工作者的工作場域來檢視新聞專業。張文強 (2015) 發現，實務場域有一套工作邏輯，讓他們以不同於新聞專業想像的標準處理新聞。張文強以「做電視」取代「做新聞」說明這個現象，指出在商業思維下的媒體市場環境，觀眾收視率被列為編輯室首要目標，新聞成為一種敘事展演文類，吸引目光的素材被大幅套入預設好的立場與故事情節中，取代查證、核實等工作。這和林照真 (2005) 所提到的在賣新聞的邏輯下，「深度報導」成了「商品類型」，「主播專訪」是「產品規格」，「SNG 新聞連線」清楚標價，新聞跑馬燈也可以拿來賣錢。報紙、雜誌還會強調圖文並茂的「企劃採訪」，而為了獲得購買者青睞，更有媒體以強調曾獲「最佳主播獎」、「採訪獎」來招攬生意，有異曲同工之處。

從上述研究可知，新聞專業中「專業嚴謹的控制」指的是新聞產製過程對外部的封閉，也因這種封閉，造成新聞業的權威特質。不過解嚴以來，受到政治和商業因素的影響，新聞從業人員的專業和工作連繫已經大不如前，收視率帶給媒體商業思維的衝擊，已經瓦解部分新聞的專業基底，如張文強提到的「做電視」取代「做新聞」，預設立場的腳本和故事情節成

為新聞敘事主軸，違反 Deuze (2003) 所說的新聞是提供信息而不是先入為主的觀點之原則。更無法與社會大眾公開對話。

近年來，台灣的網路和社群媒體普及，帶給新聞媒體快速又強烈的衝擊。根據 MMA (台北市媒體服務代理商協會) 近期公佈的「2017 年台灣媒體白皮書」，台灣網路廣告加速成長，傳統媒體加速衰退。網路廣告於 2013 至 2016 年的成長率，依序為 17.8%、18.3%、19.6%、33.7%，相比之下，報紙、雜誌、廣播三大傳統媒體，近三年成長率分別從衰退個位數到兩位數，2016 年甚至衰退超過兩成。

一些研究發現，新聞媒體在若干新聞報導上，已經不再重視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務的議題，例如徐美苓 (2015a) 研究發現，各媒體在提及能源類型、框架、引述消息來源等類別中有所不同。整體替代能源報導的數量雖不低，在提及可增進公眾議題參與的元素上卻相當不足。徐美苓 (2015b) 另一項研究也發現，比較台灣受訪者使用電視、報紙和網路三種媒介新聞的可信度發現，閱聽人使用新聞管道並不多元，而閱聽人對接觸特定媒介管道之新聞亦有個人偏好，當今個別新聞媒體無法避免有其特定意識型態或政商相關利益，認為媒體建立自我素養提升更是重要。

由此可知，近年新聞業內部制度邏輯已經更加疏離專業和自我提升，而會重新塑造出特定的行為模式和社會關係，而且因為網路的興起，傳統的專業新聞受到挑戰，新聞產製界線模糊，使得新聞機構本身在認知到外部競爭對手 (網路、社群媒體、公民新聞) 的挑戰時，更缺乏對於適應這種新分歧的批判性審查。

Craft & Davis (2016) 認為，全世界的新聞專業主義皆深受美國專業主義影響，李金銓 (2018) 也指出，美國媒介專業主義的脈絡是源自市場經濟的勃興，並蘊藏進步運動出來的「恆久價值」，在理念上有溫和漸進民主改革的精神。不過實際上，這種看法在近年已經波瀾起伏，飽受批判。

肆、專業主義的重建與道德勇氣的啟蒙

德國傳播學者 Deuze (2007) 分析發現，網際網路的時代裡，新聞責任已經從組織轉移到個人身上，主要原因在於新聞工作面臨許多科技改變，使得以往個人在專業上和新聞機構的連結已有不同的發展。Craft & Davis

(2016) 也指出新聞業如同其他專業，隨著社會發展，公司內部邏輯會受到挑戰，使得工作上的界線產生模糊，進而產生衝突、拉鋸，媒體機構為了適應這種分歧，反而更會去劃清或是拓展專業的界線，這就是所謂的「邊界工作」(boundary work)。

由於媒體界線模糊，「新聞」已成為一個浮動的術語，表示許多事件、人物或活動的敘事形式和認識論，取材和敘事的任意性變得更不定 (Waisbord, 2013)。新聞業也因為產品多樣性發展，使媒體之間的競爭更加激烈。記者的職業的專業性、權威感也因為網路參與文化形成和開放，使其專業權威、職業聲望和新聞是否具有「有償價值」，都出現新的選擇與爭議。

記者和新聞業的界線模糊，已使其變成不確定的角色和對非傳統新聞形式的新觀點，數位媒體引發的新聞形式和實踐的異化，進一步推動再概念化專業主義的主張 (Singer, 2003)。Lewis (2012) 也主張，新聞業的變化已產生深層影響，中介的多元聲音正在擴張，重新在傳統新聞的專業邏輯與參與邏輯之間劃出媒體存在的分歧點，專業主義提供給媒體的保護已經不太可能持續，也帶給「新聞專業」如何在社群媒體時代實踐的挑戰。

新聞專業的起源和人類歷史哲學的美德關係密切，「專業勇氣」近年被新聞倫理學者重新提起，成為新聞空間受到多種社會力侵蝕，是以應該作為反制或批判的新倫理價值觀 (Christians, Fackler & Ferre, 2011)。

「勇氣」這個概念在西方社會已有逾千年的歷史，西方歷史往往用相對獨立的無畏行為 (通常處於危險境況下) 來闡釋勇氣。但當代更以多元概念理解勇氣，回到人類共同經驗和理解，認為公民對官員產生一種犬儒主義，不再信服官員一在重複的聲稱，卻又言行不一，而認為不該一味接受，不加質疑。新聞機構如果自許為公民的代言人，就應該有專業特質，用專業標準提出質疑，這也服膺了人類原本具有這種重要的德性與經驗。

新聞倫理學者 Christians, Fackler 和 Ferre (2011: 182-183) 指出，美德是人作為人類的特質，從孔子和 Aristotle 的觀點，人類的美德是從教育和習慣長期涵養得來，可以在後來形成一種人類的智慧，以及對正義、智慧和勇氣的價值體系。

「專業勇氣」(professional courage)是個近年逐漸受到重視的概念，這個概念源於希臘哲學家 Aristotle，他曾提出五種勇氣，第一種是政治或民間勇氣(political or civil courage)。Aristotle 引用蘇格拉底的話說，勇氣是一種知識，勇氣的習性和理性推理有關(Christians, Fackler & Ferre, 2011: 92)，其動機就是一種美德，也被人認為是一種高尚的情操。勇氣作為一種德性，表現一種性格的概念，是指人類舉止表現具有一致性，它使得人類自主擁有追求更好動機，並在對的時間以對的方式做對的事，它不是為了獲取主觀的讚美，有時反而要承受長時期的痛苦(p. 96-97)。

2006年美國新聞教育學會主席 Dane S. Claussen (2006)在紐約發表演講時指出，新聞業面臨的危機是：專業知識和教育不斷與時俱進，然而最大問題是信心危機，他舉出華盛頓郵報公評人 Deborah Howell 為例說「無所畏懼」非常重要，這樣才能傾聽人們底層的心聲，而勇氣、耐心、容忍和自信都很難在學校教育中傳授，因此他說，勇氣要伴隨成熟和經驗成長，從事新聞業需要具備勇氣，才能對抗社會的不正義；新世代記者除了尊重新聞室的多元價值和有才華之外，勇氣更是專業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能力。

何謂「專業勇氣」？Bowlin (2016)指出勇氣是一種熱情，是一種道德的認識論，常和正義追求緊密相連，也會協助人們判斷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但是勇氣的實踐和環境變化一樣複雜，因為勇氣先要認知社會中有種種結構的不平等，其中以政治權力和商業所有權的結構最易產生影響，出現了被邊緣化的團體，因為有勇氣介入的德性是指先認識社會上如何產生差異、社會階層的形式為何，主導社會闡釋的支配力在哪裡，如何造成社會不公，才能批評權力和造成社會差異的責任何在，這是一種辯證關係的確定過程。

傳播倫理學者 Lambeth (1990: 37-38)曾說，專業勇氣就是一種堅忍不拔，用勇氣表現不同的行為，在專業上表現獨立，他也認為勇氣應該是專業教育的一項重要元素，在教育中要教的是討論何謂「理想的社會」。但 Lambeth 的勇氣概念比較是一種自己小我的責任及自我提升的實現。Christians 等人(2011)把勇氣和道德的想像結合，提出思與行合一的概念，並認為勇氣和傳播應該放在倫理實踐中，當作幫助閱聽人提出對專業質疑的一種思維。

倫理學者 Sandra Borden 發展新聞學實踐的德性倫理，並且把勇氣當作常規原則中應該持之以恆的美德（Borden, 2007）。她認為，新聞是一種極為特殊的知識實踐，應該要以一種協力合作的標準來調查與解釋威權機構和其表現，才有理性知識的產出（同上引：63）。新聞並非為自身目的生產，而是為了幫助公民參與和人類蓬勃發展。

Borden 相當重視德性對於人類實踐扮演的角色，另一位倫理學者 McIntyre（2007）也支持這種看法，並指出所有新聞實踐都建立在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因此需要勇氣、正義和誠實。這些美德能成為新聞實踐的核心，才能提供個別新聞工作者力量去抗拒目前專業遇到的外在壓力。

Borden 主張專業現在已經成為一種認同和孕育向心力、維護新聞工作的專業實踐，也在西方社會的個別新聞者和國際上形成一種新的新聞規範目標。這個國際化的凝聚力和價值觀，可以提供新聞業和新聞工作團體跨國的追求共同利益的支持，讓新聞記者覺得自己並不孤單，也不用害怕獨自面對打壓。無國界記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或國際調查記者編輯（Investigative Reporters and Editors）這類組織，無論在提升專業標準和具體化專業實踐都已發揮作用。

Christians 等人（2011）指出，東方的孔子曾說「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在儒家學說中，智仁勇是三達德，勇即勇氣的意思。但是專業勇氣雖然是新聞專業實踐的重要原則，卻始終僅在討論階段，沒有成為新聞專業主義的信念。不過 Schudson（2015）說，無論媒體怎麼變化，我們誰都無法擺脫集體人類知識的局限，只要我們隨時把專業知識當作新聞工作的生活常規，重視事實和理性，就不能說我們生活在後真實的時代。

儘管日常新聞工作很少需要有勇氣的行為，儘管專業勇氣過往雖然較少被提及，但新聞媒體無論追求自主、品質和服務社會人群，在複雜的政治經濟框架下，仍然需要以勇氣作為相對的常規，也呼應 Borden（2007）的看法：認為專業勇氣的概念化應從日常工作做起，亦正如 Aristotle 所說「勇氣可以成為生活中的思維和每天行動」，以此滲入新聞工作者的觀察和報導中，形成專業意願（professional willingness），勇氣不一定能在日常採訪發揮作用，卻能做到專業意願的形成，讓從業者願意從問題中學習，不怕失敗，重新嘗試，勇氣可以讓從業者更能面對各種問題。

伍、代結語

回顧新聞專業主義在台灣和美國的發展，發現台美專業主義有共同內涵，但隨著科技變革和數位化趨勢，專業概念中的客觀、真實不一定隨著市場化和自由化的特徵使一國的新聞文化呈現良性發展。

過去台灣對新聞專業的研究多半關注已開發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專業主義發展，其概念為我們熟知，也經常作為借鑑和付諸實踐的理想類型，但由於台灣在新聞或傳播專業主義的研究太少，以致無法從更全面、更動態的觀點，觀察長期處於動態變化、複雜的媒介體系以及專業之間的互動變化。但台灣學術界並未持續重視，亦未將其概念進行系統性比較。未來應以更動態、全面觀點視之。

二十世紀專業主義發展以來，西方新聞業一直將專業視為一種規範性的理想（normative ideal）。二十世紀五〇年代，台灣開始引進「新聞專業主義」的概念，一直沒有真正將其理論化。在過去發展中，新聞專業主義曾和看門狗的概念相容，也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中間也看到不同媒體角色的差異。

本文簡述台灣的專業主義發展和新聞專業化歷程，發現台灣以一種混合路徑迎向西方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專業化，建議未來應該開始確立我們缺少什麼，例如近年西方倡議的「專業勇氣」也許適合作為其中一項起步，但源於西方中心主義的專業理論不見得完全適用在台灣。

由於台灣媒介體系的複雜和不斷變化，早年的新聞記者信條和現今各電視台多設立節目暨新聞自律委員會，雖然似乎希望能從新聞專業體系，為媒體輿論監督找到一個前進的新方向和持久的路徑。然而新聞專業主義概念在台灣的踐行，對媒體要求自主經營的目標追求幫助較大，但是對於報導追求客觀公正等新聞理念和操作規範卻每況愈下。

2008年一項研究發現台灣受訪者對電視與報紙新聞可信度的感知皆為中立偏負向，且報紙新聞可信度顯著低於電視新聞可信度。徐美苓（2015b）的調查分析發現，2012年受訪者對電視新聞的可信度比2008年還要顯著下滑；報紙新聞可信度則和2008年差不多，為中間偏負面。徐美苓分析認為是因為2003年以來新聞過度強調聳動與侵犯隱私的報導風格（羅文輝，

2013)、新聞內容商業或政治置入行銷或因媒體併購引發之媒體間的攻訐造假等事件(〈臺灣媒體亂象 OUT!〉, 2012.08.02;〈新評會公布傷很大新聞排行榜〉, 2013.04.11)、以及電視新聞報導內容的不實或不公,已連續四年(2011至2014)高居民眾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申訴廣電內容比例最高的類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2014.03.17)。這些專業職業觀的下滑,媒體喪失公信力的現象,顯示新聞專業主義和專業表現日漸衰落,造成新聞媒體角色的萎縮,權威地位正在消解,值得分析的關鍵之一,正是新聞文化和政治經濟利益的潛在雜交。

歷經不同國家新聞文化的長期實證比較研究,已發現許多國家的專業主義發展走向窄化和複雜化。因此 Waisbord (2013) 認為專業主義在新聞場域,應該作為一種有特殊價值的分析概念,並應和實踐的工作價值相提並論:

當新聞系統的邊界不斷擴大。新聞在一個不斷變化的世界中航行,也面臨未來會如何的疑慮時,了解新聞業如何保持其獨特地位,非常重要。社會應該持續加強它作為專家仲裁者的角色,並試圖維護對抗外力的自主。(同上引:10)

也就是新聞專業有其複雜結構和面向,不僅表現在認知面(什麼是新聞),還有評價面(新聞角色的專業為何)、表現面(專業角色的具體化實踐)。因此 Waisbord (2013) 曾主張採用 Bourdieu 的「領域」理論和社會學「角色」理論,重新探討數位時代的新聞媒體和從業者應該有哪些更一般化的職業角色定位和再概念化; Waisbord 仍然把新聞視為專業、獨特和自主的社會領域,主張新聞從業者作為一種職業,應該是因為記者編輯有能力提供他人不能做的事,然而他也強調,從過往新聞專業主義的發展過程來看,新聞業已經需要轉型,由於社會中的公眾識辨力和批判意識正在增長,新聞業揚棄專業,反而對自身是一種傷害。作為一種職業,新聞需要「自主發展和維持純技術和專業知識的實踐規範」(Waisbord, 2013)。

本文回顧專業主義的發展和其在台灣的適用過程,並說明專業新聞的理念雖然在台灣發展起來,並被新聞教育者和新聞工作者共同理解,但從台灣傳媒體制結構來看,新聞從業者的工作中只能部分實踐專業主義。Christians 和 Nordenstreng (2004) 指出,起源於美國的社會責任理論中的

規範、監督新聞和客觀性規範成為美國和歐洲媒體機構的基石。儘管新聞工作者在各地的政治、法律和經濟條件存在極大的差異，但新聞獨立，專業和民主之間的觀念深植各地。另一方面，網路新聞講求的即時、快速性，改變記者的工作方式。雖然網路和社群媒體使記者更容易傳播新聞故事，但也打破過去記者與其他新聞組織角色的界線。例如記者除了產製新聞文字，包括拍攝照片、影片，然後編輯發表於多個媒體平台，這些新的職業義務，可能會增加記者的倦怠，疲憊和壓力。

就台灣現狀而言，台灣已受西方、特別是美國專業主義影響，新聞媒體普遍認為媒體具有監督者的角色和立場，記者和社會大眾已經同化地接受新聞應該基於事實、客觀的專業價值，即使台灣的政治經濟干預主義明顯，具有自由主義特色的新聞文化仍是媒體重要信念，但是因為媒體在實然面扮演不同角色，和社會大眾期望有相當落差。

但是從比較的觀點來看，西方社會和台灣因為社會、政治、文化的差異，實踐過程有所不同，歷經政治環境變動的國家，記者在規範面實現監督政府的角色就有很大差異。這也支持兩個重要理論：與政治體系的互動是決定新聞媒體如何運作的重要因素（Mancini, 2015）；職業角色取決於當地社會政治條件變化的特定性質，尤其特定的歷史背景非常重要（Vos, 2017）。

近年西方社會和台灣本身都對媒體濫權的媒體亂象很不滿意，也想限制媒體權力。但是西方社會本於希望媒體更專業更自由和更自主的動機，而不擬放大政治或法律權力作為規範，更不希望使新聞自律變成自我審查，導致「專業」意理變成政治法律問題，如此反而和專業主義的實踐有很大扞格。

但是台灣廣電媒體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近年卻以立法要求媒體「自律」作為媒體應有的「專業」標準。2017年1月18日NCC召開記者會，說明草擬《媒體壟斷防制與多元維護法》在對新聞媒體的專業自主部分進行適度規範。但是該法草案不但未見與新聞自主相對的新聞專業主義定義與範圍的討論，亦顯示法條文字並不清楚西方專業主義是把「自主」視為一種由新聞業自覺遵守和相互監督的行為，並不是「法律」規範對象。可知這部法案似顯示政府欲以「專業」為名，用法條建立

制度性系統性的新聞干預，此一目標將開啟新聞「專業」尋找政治化分類的約制關係，與真正自由主義的「專業自主」概念背道而馳。

如果健全的民主政治需要以新聞專業主義實現為前提，近年的倫理學者倡議的專業勇氣，將可和新聞媒體如何實踐新聞專業特質互相呼應，如今「倫理勇氣」成為許多美國記者為了追求國家利益而進行一場文化戰爭的共同信念 (O'keefe, 2018.06.14)。未來研究也有必要擴大這方面的研究，以更細緻地看出台灣在新聞實踐的新表現和新定位，並觀察專業在不同新聞之間和之內的重要微妙的差別和混合。

從這個意義上，如果台灣媒體希望借著專業主義提供新聞工作者更有力的公共服務策略和對話，推動公眾重視媒體的角色和積極改變，恐怕媒體自己本身要從混合的角色出發，了解新聞角色如何在不同情況下出現監督、中立或順從的分類，並且從組織（市場導向、政治傾向、平台技術、公共或私人媒體）、新聞常規（時效、資源、數位化、融合程度）、新聞專業開放或封閉等重要因素，持續分析新聞專業在台灣短中長期表現，以及如何解決政治社會制度帶給媒介體系的問題，有過的共同努力，以擴大我們對媒介專業的理解，提供新的見解和方向。否則新聞業遇到這些複雜又迫切的重要挑戰，任務將會更艱巨，走向專業規範實踐的道路可能更崎嶇。

參考文獻

- 〈臺灣媒體亂象 OUT!〉(2012.08.02)。《看雜誌》，118。上網日期：2013年6月15日，取自 <http://www.watchinese.com/editor/118>
- 〈新評會公布傷很大新聞排行榜〉(2013.04.11)。《中央通訊社》。上網日期：2013年6月15日，取自 <http://www.cna.com.tw/News/aEDU/201304110422-1.aspx>
- 王洪鈞(1993)。《我篤信新聞教育》。臺北：正中。
- 李金銓(1987)。《新聞的政治·政治的新聞》。臺北：圓神。
- 李金銓(2004)。《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中國文化的現代性》。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李金銓(2018.04)。〈「媒介專業主義」的悖論〉，《國際新聞界》，10：91-124。
- 李瞻(2009)。〈英美報業危機與社會責任論及新觀念之誕生〉，取自：<http://140.119.115.26/bitstream/140.119/41494/1/NccurHandle41494.pdf>
- 林照真(2005)。〈「置入性行銷」：新聞與廣告倫理的雙重崩壞〉，《中華傳播學刊》，8：27-40。
- 林麗雲(2008)。〈變遷與挑戰：解禁後的台灣報業〉，《新聞學研究》，95：183-212。
- 馬星野(1967)。〈政大新聞教育的回顧與前瞻〉，《新聞與時代》。臺北：雲天。
- 徐美苓(2015a)。〈新興環境議題的媒體建構：以台灣替代能源新聞報導為例〉，《傳播與社會學刊》，32：19-57。
- 徐美苓(2015b)。〈影響新聞可信度與新聞素養效能因素之探討〉，《中華傳播學刊》，27：99-136。
- 徐嘉宏(2003)。《台灣民主化下國家與媒體關係的變遷之研究》，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翁秀琪(1992)。〈工作權與新聞記者之自主性〉，翁秀琪、蔡明誠(編)，《大眾傳播法手冊》，頁297-327。臺北：政大新聞系。
- 張文強(2015)。《新聞工作的實用邏輯：兩種模型的實務考察》。臺北：五南。

- 張曉、羅文輝、郭佳、汪婧、徐昌鵬、余舒虹、張芳（2015）。〈新聞教育的危機：中港台新聞系學生的未來職業抉擇〉，《中華傳播學刊》，28：123-154。
- 陸曄、潘忠黨（2002）。〈成名的想像：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新聞從業者的專業主義話語建構〉，《新聞學研究》，71：17-59。
- 新聞媒體自律協會（2016）。〈第一節 新聞評議會緣起〉，取自：<http://www.xn--fiq46nqybr7dy7ug1bx8o7l6bxygejr70c.tw/%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6%96%B0%E8%81%9E%E8%A9%95%E8%AD%B0%E5%A7%94%E5%93%A1%E6%9C%83%E5%A7%94%E5%93%A1%E6%9C%83%E7%B7%A3%E8%B5%B7/>
- 臧國仁（1998）。〈新聞報導與真實建構：新聞框架的理論與觀點〉，《傳播研究集刊》，3：1-102。
- 蔣海斐（2010）。〈馬星野的新聞活動與新聞思想〉，取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525a350100n300.html。
- 潘忠黨、陳韜文（2004）。〈從媒體範例評價看中國大陸新聞改革中的範式轉變〉，《新聞學研究》，78：1-43。
- 盧治楚（1969）。《我國新聞評議會之研究》，政大新聞所碩士論文。
- 薛心鎔（2003）。《編輯台上一三十年代以來新聞工作剪影》，臺北：聯經。
- 羅文輝（1998）。〈新聞人員的專業性：意涵界定與量表建構〉，《傳播研究集刊》，2：1-47。
- 羅文輝（2013）。〈報紙與電視新聞可信度：1993、1998 和 2003 年度的比較研究〉，張茂桂、羅文輝、徐火炎（編），《台灣的社會變遷 1985~ 2005：傳播與政治行為》，頁 65-91。臺北市：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羅文輝、陳韜文（2004）。《變遷中的大陸、香港、台灣新聞人員》。臺北：巨流出版社。
- 羅文輝、陳韜文、潘忠黨（2001）。〈大陸、香港與台灣新聞人員對新聞倫理的態度與認知〉，《新聞學研究》，68：53-89。
- 譚士屏（2000）。《台灣報紙產品市場競爭行為分析（1988-1999）》。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Althaus, S. L., & Tewksbury, D. (2002). Agenda setting and the 'new' news: Patterns of issue importance among readers of the paper and online versions of the New York Time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9(2), 180-207.
- Arno, A. (1984). News as storylines. In A. Arno and W. Dissanayake (Eds.), *The news media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Artwick, C. G. (2013). Reporters on Twitter: Product or service? *Digital Journalism*, 1(2), 212-228.
- Beam, R. A., Weaver, D. H., & Brownlee, B. J. (2009). Changes in professionalism of U.S. journalists in the turbulent twenty-first century.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6, 277-298.
- Becker, H. (1976). Art worlds and social type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9(6),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fu.ca/cmns/courses/2011/488/Readings/Becker_SocialTypesofArtists.pdf
- Becker, H. S., & Carper, J. (1956). The elements of identification with an occu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1, 341-348.
- Benson, R. (2005). *Bourdieu and the journalistic field*. New York: Polity.
- Borden, S. L. (2007). *Journalism as practice: MacIntyre, virtue ethics and the press*. Hampshire, England: Ashgate.
- Bourdieu, P. (2005). The political field the social science field, and the journalistic field. In R. Benson, & E. Neveu (Eds.). (pp.29-47). New York: Polity.
- Bowlin, J. R. (2016). *Tolerance among the virtu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arey, J. W. (1978). A plea for the university tradition. *Journalism Quarterly*, 55,845-855.
- Carlson, M., & Lewis, S. C. (Eds.). (2015). *Boundaries of journalism: Professionalism, practices, and participati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 Champagne, P. (2005). The “double dependency”: The journalistic field between politics and markets’, In R. Benson & E. Neveu (Eds). *Bourdieu and the Journalistic Field* (pp.48-63).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Chan, J., & Lee, C. C. (1991). *Mass media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The Hong Kong press in China's orbit*.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Christians, C. (2011). *Media ethics: Cases and moral reason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ristians, C., Fackler, M., & Ferre, J. R. (2011). *Ethics for public communication: Defining moments in media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ristians, C., & Nordenstreng, K. (2004). Social responsibility worldwide.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19 (1), 3-28.
- Chyi, H., Lewis, S., & Zheng, N. (2016). Parasite or partner? Coverage of Google News in an era of news aggregation.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93(4), 789-815.
- Claussen, D. S. (2006). Journalism is still not for the faint of heart.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61(3), 235-238.
- Craft, S., & Davis, C.N. (2016). *Principles of American journalism: An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Curran, J. (2010).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 11(4), 464-476.
- Deuze, M. (2005). What is journalism?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ideology of journalists reconsidered. *Journalism*, 6(4), 442-64.
- Deuze, M. (2007). *Media work*. Cambridge: Polity.
- Donsbach, W. (2014). Journalism as the new knowledge profession and consequences for journalism education, *Journalism*, 15(6), 661-677.
- Ettema, J. S., Whitney, D.C., & Wackman, D. B. (1987). Professional mass communicators. In C. R. Berger & S. H. Chaffee (Eds.), *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pp. 747-80). Newbury Park, CA: Sage.
- Evetts, J. (2011). A new professionalism?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Current Sociology*, 59, 406-422.

- Evetts, J. (2013). Professionalism: Value and ideology. *Current Sociology*, 61, 778-796.
- Evetts, J., & Dingwall, R. (2002). Professional occupations in the UK and Europe: Legitimation and governmentalit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12(2),159-171.
- Flint, L. N. (1925). *The conscience of the newspaper*.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 Franklin, B. (2012).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Developments and debates. *Journalism Studies*, 13(5–6), 663–681.
- Franklin, B., & Carlson, M. (2011). Journalists, sources, and credibility: New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 Freidson, E. (1999). Theory of professionalism: Method and substanc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9, 117-129.
- Friedland, R., & Alford, R. (1991). Bringing society back in: Symbols, practices and institutional contradictions. In W. Powell & P. Di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pp. 232–263).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ans, H.J. (1979).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Glasser, T., & Gunter, M. (2005). The legacy of autonomy in American journalism. In G. Overholser and K. Hall-Jamieson (Eds.), *The press* (pp. 384-9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reenwood, E. (1957). Attributes of a profession. *Social Work*, 2, 45-55.
- Hallin, D. C. (1986). *The uncensored war: The media and Vietna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nitzsch, T. & Mellado, C. (2011). What shape the news around the world? How journalists in 18 countries perceive influences on their wor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86(3), 404-26.

- Hwang, H., & Powell, W. (2009). The rationalization of charity: The influences of professionalism in the nonprofit sector.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54(2), 268-298.
- Johnstone, J.W., Slawski, C.E.J., & Bowman, W.W. (1976). *The news peopl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Knight, M., & Cook, C. (2013). *Social media for journalist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London: Sage.
- Lambeth, E. B. (1990). Waiting for a new St. Benedict: Alasdair Macintyre &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journalism.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Ethics Journal*, 9(1/2), 97-108.
- Larson, M. (1977).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ee, C.C. (1993). Sparkling a fire: The press and the democratic change in Taiwan. *Journalism Monograph*, No. 128.
- Lehmann-Jacobsen, E. (2017). Challenged by the state and the Internet struggles for profess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n journalism. *Journa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62, 18-34.
- Lewis, S. C. (2012). The tens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control and open participation: Journalism and its boundarie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5, 836-866.
- MacIntyre, A. (2007). *After virtue* (3rd ed.).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 Mahugo, S. M. (2010). Reinventar el periodismo: medios necesariamente más Participativos para una sociedad más democrática [Reinventing Journalism: More Essentially Participative Media for a more Democratic Society].” *Razón y Palabra*, 73. from <http://www.razonypalabra.org.mx/N/N73/MonotematicoN73/13-M73Mahugo.pdf>.
- Mancini, P. (2015). The news media between volatility and hybridization. In J. Zielonka (Ed.), *Media and politics in new democracies: Europe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 25-3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cDevitt, M. (2003). In defense of autonomy: A critique of the public journalism critiqu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3 (1), 155-164.
- McQuail, D. (1992). *Media performance: Mass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London: Sage.
- Mellor, N. (2009). Strategies for autonomy: Arab journalists reflecting on their roles. *Journalism Studies*, 10(3), 307-21.
- Merrill, J. (1989). *The dialectic in journalism: Toward a responsible use of press freedom*. Baton Rouge: Louisiana University Press.
- Newton, L. H., Hodges, L., & Keith, S. (2004). Accountability in the professions: Accountability in journalism.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19, 166–190.
- O’keefe, J. (2018.06.14).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moral courage, and the fight for our Country. *The Epoch Times*, from https://www.theepochtimes.com/investigative-journalism-moral-courage-and-the-fight-for-our-country_2562106.html
- Patterson, T. E., & Donsbach, W. (1993). *Press-party parallelism: A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Paper presented in the annual meeting of ICA, Washington DC.
- Pavlik, J. V. (2013). Innovation and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Digital Journalism*, 1(2), 181–193.
- Ramirez de la Piscina, T. R., Zabalondo, B., Aiestaran, A., & Agirre, A. (2016).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Who to believe? Different perceptions among European professionals and internet users. *Journalism Practice*, 10(1), 71-92.
- Ramonet, I. (2011). La explosión del periodismo. De los medios de masas a la masa de medios [*The Journalism Explosion. From the Mass Media to the Mass of Media*]. Madrid: Clave intelectual.
- Rao, H., Monin, P., & Durand, R. (2003).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oque Ville: Nouvelle cuisine as an identity movement in French gastr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8(4), 795–843.

- Reese, S. D. (2001). Understanding the global journalist: A hierarchy-of-influences approach. *Journalism Studies*, 2(2), 175-187.
- Ryfe, D. (2009). Structure, agency and change in an American newsroom. *Journalism*, 10 (5), 665-683.
- Schudson, M. (1978). *Discovering the new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 New York: Basic Books.
- Schudson, M. (2015). *The rise of the Right to Know: Politics and the culture of transparency, 1945-1975*.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ilverman, C. (2014). *The verification handbook. Ultimate guideline on digital age sourcing for emergency coverage*. Maastricht: The European Journalism Centre.
- Singer, J. B. (2003). Who are these guys? The online challenge to the notion of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Journalism*, 4 (2), 139-163.
- Singer, J. B. (2007). Contested autonomy: Professional and popular claims on journalistic norms. *Journalism Studies*, 8(1), 79-95.
- Splichal, S., & Sparks, C. (1994). *Journalists for the 21st century: Tendencies of professionalisation among first-year students in 22 countries*. Norwood, NJ: Ablex.
- Starck, K., & Sudhaker, A. (1979). Reconceptualizing the notion of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across differing press system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4, 33-52.
- Svensson, L. G. (2006). New professionalism, trust and competence: Some conceptual remarks and empirical data. *Current Sociology*, 54, 579- 593.
- 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Tunstall, J. (1971). *Journalists at Work: Specialist correspondents: Their news organization, news sources, and competitor-colleagues*. Beverly Hills, CA. Sage.

- Vos, T. (2017). The paradigm is dead, long live the paradigm.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19(4), 304-311.
- Waisbord, S. (2013). *Reinventing professionalism: Journalism and news in glob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Weaver, D. H. (1998). Journalists around the world: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D. H. Weaver (Ed.), *The Global Journalist: News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pp. 455–480).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 Weaver, D. H., Beam, R. A., Brownlee, B. J., Voakes, P. S., & Wilhoit, G. C. (2009).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in the 21st century: US news people at the dawn of a new millennium*. New York: Routledge.
- Wilensky, H. L. (1964).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everyon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0, 137-158.
- Williams, R. (1972).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Hanover, NH: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 Willnat, L., Weaver, D., and Choi, Jihyang (2013). The global journalis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 Cross-national Study of Journalistic Competencies. *Journalism Practice*, 7 (2), 163–183.
- Witschge, T. (2012). Changing audiences, changing journalism.” In Peter Lee-Wright, Angela Phillips, and Tamara Witschge (Eds.), *Changing journalism* (pp. 117-134). London: Routledge.
- Zelizer, B. (2004). *Taking journalism seriously: News and the academy*. Thousand Oaks, CA: Sage.

Professional Journalism: Media Practice and The Issues Facing Taiwan

Herng Su

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conceptual change of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in Western society. Then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elusive concept of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in Taiwan and how it evolves in this highly competitive media environment.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western professional journalism was founded on the premise of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The paper looks into the issues and challenges to media professionalism brought by the political interferences from both press-party parallelism rule.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introduction and adoption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m varies in different historic context in Taiwan because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has a blurred boundary. Taiwan still faces many difficulties in its adoption of media professionalism. Ethicist Sandra Borden has developed a normative theory of journalism as practice based on virtue ethics and relying on courage as one of the sustaining virtues in the normative endeavor. Aristotle and Confucius both said that courage was a kind of knowledge. This conceptualization of professional courage can be at the core of news work as it is defined in the field of virtue ethics. Such actions can be journalists who see themselves and their profession as fundamentally connected the creation of a better society that enables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to flourish. Journalists and journalism are clearly included in this effort.

Keyword: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media in transition, professional courage, new media, Taiwan